

目 录

序言.....员
 导言.....员

第一部分 从北宋到南宋

一、关注差异	源
线索与方法	愿
资料与假设	猿
二、宋代学术	愿
文学	怨
经学	圆
史学	园
三、宋代儒学	猿
思想与制度	猿
不同派别的新传统思想	猿

第二部分 20世纪

四、道德保守主义	源
亡国之耻的震撼	源
变革之门的关闭	缘
保守主义者的正统要求	源
五、专制政体与宰相们	苑
走马灯般的宰相 方显赫 方显赫 雪	苑
宰相团队 方显赫 方显赫 及以后 雪	愿
权相长期独掌朝纲 方显赫 方显赫 雪	愿

别有用场的前宰相	冤
六、个案研究：从辉煌到流放	怨
谁有资格做榜样？	怨
初擢签书枢密院事	怨
宰相团队和国家政策	冤
道德保守主义者的政治风格	冤
从巅峰到低谷	冤
第三部分 新儒家成为正统 得不偿失的胜利	
七、道德挂帅的新儒家：从争论、异端到正统	冤
分析架构	冤
道德先验论者自命正统	冤
思想的传播与道德的结合	冤
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	冤
失算的“伪学”之禁	冤
从危机到国家正统	冤
余论	冤
注释中所用简称	冤
注释	冤
参考书目	冤

序 言

来到 19 世纪，中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转折。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携蓄着巨大的能量，看起来似乎将生生不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引发转变。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初期。其原因何在？这场转折，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关节所在，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个案。

一些教科书将这个时期即宋代中国 ~~宋元~~ 描述为“近代初期” ~~宋元~~——大城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贸易的发达，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称奇，尤其是纸币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想像的。伴随着经济进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达于巅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文学艺术的种种成就，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重构。宋代中国因而具有了与近代欧洲相类似的某种表征，而且，它比欧洲要早得多。

本书却秉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论前提

是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

viii

可想而知,将宋代中国视为“近代初期”的东西方史家是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之下,将欧洲历史当做了度量衡。因此,对于宋代,他们同样强调经济因素。但是,无论这些因素本身是多么重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

或者可以这样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总体而言,官僚统治阶级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中受益。它不允许商人或商人利益在决策中发出强音。的确,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的纵向社会流动加入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从此也便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经济背景。

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仅此而已。

假如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发达和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却反而转向了内向?这便是本书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对许多人和事,我都怀着无比的感激。对我的妻子刘王惠箴博士,我要感谢她从未间断的宽容和谅解;对中国燕京大学和美国哈佛原燕京学社已故的洪业教授,我要感谢他在学术上的多方垂范;对我的母校匹兹堡大学已故的,我要感谢他们时

常提醒我要立论持平;对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杨联先生,我要感谢他的博学多闻,在我做客坎特伯雷的数年中,他曾慷慨地给予我建议;对已故的,我要感谢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时给予我的鼓励;对杜维明教授,我要感谢他源源不断的激励,在他前往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重返哈佛之前,我们曾在普林斯顿共同设计课程和从事编辑工作;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的,他参与我的讨论课程,对我的研究一直保持兴趣。

我从与多位海外学者的不断交流中获益良多。在台北,有宋和王德毅教授;在北京,有邓广铭、王曾瑜、陈智超以及其他多位教授;在东京,有已故的青山定雄教授和我特别要提到的斯波义信教授;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京都的宫崎市定、佐伯富、竺沙雅章、梅原郁、衣川强诸教授。当然,本书的错误一概由我个人负责。

最后,我要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出版部的,她以最大的耐心编辑本书,促其面世。我在普林斯顿东亚研究系的同事,也曾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建议。

导 言

南宋王朝乃是在错综纷乱的战火和灾难中诞生，然而，它最初几十年的政治、文化发展趋势却将塑造此后中国的形象，其影响绵延若干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所遭遇的为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的打击，正部分契合了中国历史的大轮廓。知过往所以鉴未来，为了解10世纪的特殊品格，有必要对此前的历史作一番简短回顾。

作为此期历史的较远背景，唐代是必须加以关注的。从7世纪到9世纪，唐帝国是人类文明的巅峰，它世界性的文化光芒从太平洋之滨一直投射到中亚细亚。唐和波斯、印度保持着松散的往来，对遥远而落后的欧洲则完全未知。9世纪初，地方性的军事篡权者纷纷建立独立王国，唐王朝陷入军阀割据的灾难之中。内乱之外，又添外患，富于侵略性的北方游牧集团越过充满传奇色彩的长城一线，侵入中国北部。对于生活在平原上、以农耕为业的中原汉人来说，他们是外来的征服者，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吸收了唐文化的多元因素，并与其本民族文化相融合。

汉化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土地和悠久

的传统,长期战乱、异族入侵都未能阻挡它顽强的发展。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经济增长依然活跃。一旦宋朝灭亡,南宋建立,和平重现,汉文化又将以更新、更强的生命力开花结果。

宋王朝统一了唐帝国的大部分农耕地区,但不是唐帝国的全部疆域。它采取亚洲定居国家遭受马背民族威胁时的通常对策,向北方好斗的邻居——契丹帝国缴纳岁币,来购买和平。一个半世纪以后,新的游牧民族出身的征服者——女真崛起。女真先是与宋结盟共灭契丹;而后继续推进,试图吞并整个黄河流域。那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被汉人充满深情地称为“中原”的地域。女真建国号为“金”,宣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并索取比契丹高得多的岁币。宋朝百般努力,均未能收复北方领土,只好在中国的中、南部重建王朝,后世称之为“南宋”,其领土仅相当于原来的 圆

到 圆世纪,又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的出现,宣告了南北分立局面的终结。这个世界征服者,像旋风一样席卷了从黄海到维也纳之门的整个欧亚大陆。在中国,蒙古人的朝代被称为“元” 圆像那些取代唐朝的游牧民族一样,他们逐渐接受了汉人的方式。在西方,地理大发现激发了欧洲的扩张,世界历史进程正在发生转向;而中国人却继续以其独特的方式延伸着其独有的文化。直到 圆世纪,宋代汉人生活中最富特色的东西仍然清晰可辨。

国家被异族所征服,而汉文化延续不衰,二者相互平衡,构成中国历史的模式之一。汉文化绵延不绝,但绝非静止不变。这是历史的大轮廓,它传递着某种真实。然而,要想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全景,就必须靠得更近一些,仔细观察那些构成历史发展轮廓的细小片断。每个王朝既有相似之处,更有独特之处。具体到宋朝,至关重要的是观察南宋之所以区别于北宋 圆

构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因素,它将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当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有鉴于此,本书开宗明义,把研究焦点置于 圆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

猿

第一部分 从北宋到南宋

一、关注差异

苑

现代历史学家大多倾向于按照中国史料传统，以朝代划分中国历史。然而，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①。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而后者正是本书的研究主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

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

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②

举例而言，在政府方面，宋代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官僚行政体制。^③皇帝之下，是庞大的集权制行政机构，其成员为士大夫，愿其中的大多数通过公平的书面考试入仕，通过资历、德行评定和荐举循资迁转。他们遵循特定的律、令、格、式和编敕处理行政事务。这些官僚并非拥有封建领地的世袭贵族，因而需要在城市里置办永久性居所。在宋代中国，人口在 50 万以上的城市有两打之多。当威尼斯和巴黎还只有 5 万居民时^④，北宋首都开封就已经拥有 50 万人口，而南宋首都临安的城市人口则达到 50 万。更重要的是，开封、临安以及其他大城市是活跃而开放的^⑤，商业、手工业和娱乐业欣欣向荣。儒、释、道三教的活动和节日并存，纸币在流通^⑥，印刷术尽管还不是活字印刷，使书籍变得容易获得和相对便宜。生活优裕的士大夫与劳动阶层比邻而居，朝夕相对。官员、商人、香客和流浪艺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旅行，将市民文化传播到乡村。驱乡过节的工人则把最新的流行带回家乡。尽管只有少数商品已经形成全国性市场，多环节的供应渠道却已经使得大米、茶、丝等商品形成了地区间和地区性的贸易市场。

与市民生活同等重要的是农村生活，宋代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是当时世界上最高产、技术最发达的农业。^⑦早熟水稻良种的推广使得同一地块上的一年两熟制成为可能，而与此同时，欧洲却仍然盛行着落后的二田制或三田制，每年都有一半或更多的可耕地处于抛荒状态。灌溉用水车以及水动的给水、排水、脱粒、碾磨机械的发明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加之大约人均两英亩的可耕地，所有这些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农业国。制造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瓷器等优质

商品的制造方面，许多工序是在拥有 ~~缘因~~名雇工的工厂里完成的，这些工人按照一定的劳动分工工作。^⑧

怨 所有这些关于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起来的确相当“摩登”，因此，此期有时又被贴上中国近代初期的标签。^⑨然而，这种观点却不无漏洞。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近代化的外表之下，却自相矛盾地生长出顽固的传统。那些可以被描述为近代特征的东西，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它们继续发展，但不是扩展成为新的思想和技术，而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举例言之，尽管出现了商业主义的抬头和经济的不断扩展，士大夫们却仍然瞧不起商业和制造业，而更愿意追求经典教育和仕途。首先是政府作为团体，其次是官僚作为个人，构成了商品的最基本消费者，而两者都无意推动商业的发展。11世纪中叶王安石变法之后，他们甚至对政府计划经济也兴趣全无。相反，当时势艰难时，他们强调节俭，重申儒家对于父系家族集团的重视，以此来促进人际互助。^⑩族规家范重新强调祖先崇拜的礼仪和儒家关于家庭的实际责任，其理由正和数百年前这些观念被首度表述出来时相仿佛，那时处于贵族社会中的人们渴望通过建立人际纽带寻求安全感。^⑪从以上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宋代中国特别是南宋，是顾后的，是内向的。许多原本趋向洪阔的外向的进步，却转向了一连串混杂交织的、内向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强化，这中间必有缘故。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奇特的转变？

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⑫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

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宋代以后的中国或可称为新传统主义的，因为它重新发展了中国文化，在旧的基础之上萌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又融会为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经历修正、更新、丰富、完善的有机体。

打个比方，宋代中国就像是一棵茂盛的老树，它爆发出令人称奇的生命力，长得比从前更高更大，新枝嫩叶覆盖着树身，树干下古老的根须在伸展。而后，一个风暴的季节损耗了它机体内部的活力。残存的生命力转变成自我保护的功能。老树尽可能顽强地继续生长，而它的大小和形状却保持不变。那么，什么是它机体内部的致命变化？

仔细考察两宋之际的中国，给历史学家们留下印象更为深刻的往往是 11世纪即北宋中期的多姿多彩的发展进步，而不是这些进步在 12世纪即南宋所发生的转变。然而，更深入的研究却将使我们的观察更为敏锐。事实上，就在 12世纪持续发展的表象之下，质变已经出现。

抓住两个世纪之间质的区别的最便捷的办法，是强调彼此间的显著差异。这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差异并非全部事实。它们只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观察所得的镜像，正如我们在特殊光线下透过放大镜所看到的那样。

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勃。与之相比，在 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延续、综合、提炼的趋势并不意味着 11 世纪的精英文化走向保守。“保守”一词的字面意思无法揭示 11 世纪文化的真实意涵,事实上,它从未停止发展。相反,它向着比过去更深刻、更纯正,有时甚至是更高明的境界发展。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深深地植入了全体中国人的寻常日用之中。这一点,特别要归功于新的儒家哲学流派即通称新儒家的努力,他们致力于教育和社会的重建。新儒家兴功之巨,惠人之众,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是绝无仅有的。^⑩但是,他们的努力绝大多数遵循固有轨道,极少试图探寻新的方向。简言之,精英文化在发展,但其发展限定在固有的范围之内,其创造力遭到了抑制。正是在此意义上,本书认为,从 11 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当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又是为什么?

线索与方法

治史者多依兴趣之不同而偏重北宋或南宋。例如,研究北宋政治的论著多于南宋,而研究南宋经济和艺术的超过北宋。研究哲学的论著,大量集中于南宋的领军人物朱熹。19 世纪 60 年代有时还将这位正统新儒家的集大成者和开山鼻祖比拟为托玛斯·阿奎那。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论著很少明确注意到 11 世纪之交所发生的变化。对于变化的原因,一般论著的看法虽有欠深入,但却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寻根究底。^⑪

第一个观点是政治地理学的:相对于大金,南宋版图萎缩,沦落为次等国家,士大夫的眼光和视野因而变得短浅低下。这理论看似合理但并不充分。北宋的领土比大唐要小得多,但其

士大夫却从未受到类似的限制。事实上,南宋的地理面积也不容低估。它开发西南,拓展其内陆领土,它改善交通手段,成果几乎遍及全境,让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远行。人们可以通过旅行来扩展视野,但参与者中士大夫为数寥寥。同样,随着海上交通线的开辟,人们可以到越南、泰国经商、游览以至定居,但参与其事的士大夫屈指可数。事实如此——虽然南宋的军事和外交相对软弱,但其文化的优越地位和优越感并未受到挑战。

第二个观点与第一个相关联:为抵抗外族威胁所消耗的巨额军费,奢侈腐朽的统治,导致文化发展资源不足。军事耗竭了资源,这是事实。但是,可供资源这一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究竟是否具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仍然值得质疑。再说,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考虑:士大夫在自己的财产之外,是否还曾经力图从国家和地方集团中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他们所热衷的文化事业?

第三个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思路:财富集中在地主或土地所有者阶级手中,他们沉溺于舒适享乐和奢侈品,既不为经济发展进行再投资,也不支持文化进步。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统治阶级兼文化精英是由作为经济集团的地主阶级和士大夫重叠而成的。因此,只能说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甚至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违背。如果是这样,那又怎么解释社会结构与南宋相同的北宋所取得的辉煌文化成就?

第四个观点来自典型的中国传统历史观:皇帝没能听从儒家的好建议,作了坏决定。当皇帝在其位而不亲其政,将权力托付给代理人时,后者蠹政祸国,情况会变得更糟。这个观点基本正确,但还不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毫无疑问,代理人可以决定政策和政局。但是,坏的政策和政局是如何影响知识分子的文化取向的呢?这中间是否存在一个被忽略的环节?

上述观点是解决问题的有益线索,不可置之不理。比如,南宋士大夫的见识确实呈现出受地域限制的特点,但这不是因为帝国的范围比以前小,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得彼此太过靠近。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考量,他们希望尽可能久居首都临安地区。他们在邻近首都的地域购置私人住宅和地产,比如杭州湾沿岸、长江三角洲或浙江东部。事实上,同故都开封相比,杭州的景色和气候都更加宜人。^⑮再说,长江三角洲和浙江的太湖流域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化史比如绘画史中得到了了解。因此,当开封不再是首都,构成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最重要因素——官僚退场之后,开封便退化成为不起眼的地方性城市。相比之下,临安则不同,即使不再是政治上的首都,它的自然环境,它作为港口城市的商业便利,以及它处于两大文化走廊结合点的位置,都使临安得以继续它的繁荣。与之相矛盾的是,生活上的不假远求于门槛之外,却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南宋士大夫视野的狭窄。

强调资金耗于军事或者地主阶级奢侈生活的观点,启发我们联想到儒家内部的不同派别。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曾经采取激烈措施推进行政改革,寻求天下之财的生长之道,限制税收体制中的误收、滥收,大刀阔斧地推行各种机构改革。^⑯改革措施的废除不只是一桩经济事件。正如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用经济原因解释历史的理论通常所宣称的,它是一项关系到整个地主统治阶级的政治决策。当然,决策的制定还取决于官僚集团当权派的思想派别以及当时盛行的思想取向。

由此导向第四个即传统观点。除了判断皇帝或其代理人德行的善恶之外,现代政治学希望寻找进一步的解释:他们究竟握有多大权力,和别人分享的权力有多少。这就需要我们对权力结构加以检视。当宫廷和官僚能够有效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

政府,我们说中央控制力量是坚强的;当皇帝或其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无论是出于个人意志还是制度使然,而官僚只能例行公事地从旁赞助,我们称之为宫廷的集权。当决策由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二者共谋,而官僚基本上无所折冲于其间时,我们称之为专制。专制是君主政体的一种独特运行模式。

在专制政体下,官僚分享行政权力但极少参与决策。当专制君主或其出身高官的代理人大权独揽,对反对意见采取不容忍甚至压制态度——不论这反对意见来自其他官僚、在野知识分子还是信仰坚诚的民间学者——专制便上升为独裁。独裁是君主政体的另一种运行模式,其本质,不仅意味着对决策权的任何分享都不复存在,还意味着对官方意识形态如儒家思想权威的否定和游离。但独裁尚非暴政,因为它还颁布法律并有序运行。当然,权力构架的实际运行往往叠合了多种模式,中央控制、集权、专制、独裁等概念只可作为参照而已。

在宋朝,皇帝及其代理人之下是普通官僚层级。他们拥有自己的行政权限,可以通过官方或私人渠道表达个人观点,以此来扮演其政治角色。统治阶级中的这一群体,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士大夫”。有趣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斥责他们,传统和现代的中国学者批评他们,但都没有具体分析其政治角色,更谈不上将其知识分子角色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独立分析,而忽略这一活跃的历史因素必将使我们错过大段的历史或曰事实。

那么,宋朝的士大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是受过儒家经典及相关知识教育的无数个人,因此有时又被称为“士”。通过荐举或科举考试,他们成为文官集团中的终身成员或曰职业官僚。如此这般,他们构成统治阶级。他们拥有土地,但是一般而

言,以中国社会结构的价值标准衡量,这一点对他们来说远不如权柄、官阶、学术声望来得重要。士大夫兼学者与官僚于一身,故此,下文将着重考察其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活动是如何交织结合在一起的。

在宋朝,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书籍付诸印刷,科举考试的吸引力大大提高,知名学者、成功士大夫的地位也在不断抬升。但是,本文无意对其全体作出研究,而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几位最杰出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知识分子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诸如学者、作家、有学问的人、院士、教师,甚至有学问的官僚或明智的政治家等等宽泛名词的同义语。知识分子是具有精英地位的杰出学者,有着公认的学术成就,通常拥有官职或曾经在政府中供职,他关怀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利益,并能与他人分享其关怀,通过分享影响或试图影响思想和公共事务的发展趋势。这个定义将大多数普通文人,即“布衣”排除在外。丝织品是拥有官阶或功名的精英的社会标志,普通文人则无权穿用,故称“布衣”,其社会地位低于精英。的确,不少“布衣”以其卓越的学识成为杰出的民间学者,获得了一些显要士大夫的尊敬与庇护,并能在地方教育或其他社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他们通常缺少权力,其社会地位与精英并不平等。因此,严格说来,此类民间学者,除非曾经影响一时之思想文化—政治走势,不可目为知识分子。同样标准适用于对功名持有者和士大夫的考量。其中的某些人确实比别人更有学问,并以其渊博的学识或其他成就受到侪辈的尊崇,又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他们称为知识分子。

宋代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价值观念集中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福利两大领域^①,他们通过对此类价值观念的探询追索求真

理。真理即儒家所谓的“道”,其含义超越各种特定学术专业的狭隘范畴。^②尽管一般而言,一个知识分子总要通过科举成为官员,但是,对“道”的最高追求始终要重于他对官僚生涯的渴望。^③他是一个官员,却从不把自己局限在衙门的日常争讼中,而是保持着广泛的兴趣,关心国家政策、道德水准、精英行为、哲学倾向、社会福利和教育。一句话,他关怀儒家的理想生活之道。当与现行政策相忤时,不管在位还是遭罢免或主动辞职去位之后,他都会保持着同样的关怀而成为反对派精英的一分子。不管情势如何,他始终有一份同他人沟通的强烈欲望;因为他知道,单人独马绝不足以实现这些公共利益,必须说服其他人与自己朝着同一方向努力。简言之,知识分子是政治—思想文化舞台上的领衔主演。

这个定义不独适用于宋代中国。对国家事务的关怀和强烈的积极沟通意识对于其他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同样适用,比如法国大革命前夜,那是“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的时代^④和俄国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当然,现代的革命语境与宋代无关,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儒家信仰从不主张用暴力改变社会秩序。^⑤

资料与假设

观察两宋之际的转折,必须聚焦于从女真入侵到高宗在位期间,即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南宋中兴、在南方再造宋朝的时期。此期既有表面上的大变动,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关键事件更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以往的研究却大多围绕着几个战争英雄以及南宋朝廷所接受的屈辱和平。事实上,古代的史学家为我们研究此期的朝廷政治和思想文化氛围留下了丰富的史

料,其主干包括《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以及相当数量的士大夫文集和各类笔记小说等。^①

两位历史学家在事后迅速而敏锐地意识到,此期正是帝国的存亡之秋,他们各自完成一部有关此期历史的宝贵著作。第一部《三朝北盟会编》^②,是一部资料汇编。经过筛选的资料按编年顺序附录在每一重大事件之下,此事与彼事之间的联系往往显得不甚清楚。汇编者既没有打算组织这些信息,也不打算评价它们,但却搜集了足够多的原始史料和其他散见的士大夫记载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应当为此感谢他。

第二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堪称典范,著者为史学家李心传。^③建炎是中兴之主的第一个年号,因此,该书又或可称为《南宋建立以来的要事编年》。举世公认,李心传是一位能以最小的偏见最大限度地传递信息的学者。这种品质施之于一段多事之秋的历史的写作,更显弥足珍贵。绍兴二十五年左右,中国传统史学正处于实证研究的巅峰时期,几位著名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著成不朽巨著《续资治通鉴》,其中大量引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其著者只在其中少数记载中发现有细小的错误。^④

然而,宋亡之后,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系年要录》却从政府和大图书馆中消失了踪影。令人不免惊讶和遗憾的是,官修《宋史》的编辑者从未看到过这部书。还好,到了明朝初期,这部书又悄无声息地重现人世,与大批书籍一同被编入15世纪早期的巨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而当时的历史学家还没有注意到它。只有到了1561年,它才被“重新发现”并整理恢复成为一部独立行世的著作。这就使我们比那些主要依靠正史的前辈研究者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实际上,本书的主要资料正来自这部《系年要录》。

仔细研究《系年要录》便会发现,在这个大转折的时期,存在

着三个互有重叠而又各具主题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女真入侵和北宋悲剧性的灭亡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屈辱。最让知识分子们感到震惊的,是那些他们熟识或曾闻其名的众多士大夫的无耻行径。显然,已有的儒家学说,不管其内容多么丰富多彩,在那些令人震惊的恶行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个粗暴的警示鞭策那些幻灭的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相信儒家遗产亟须重建和加强。因此,第一阶段的主题便是震荡和反应。

第二阶段大致起于1132年杭州被选为朝廷的临时行在,止于1137年正式定都杭州,其主题是知识分子从关注制度转向道德关怀。南宋初期,不论是否出以公心,许多知识分子将帝国的衰亡归咎于1126—1127年间武断的变法,以及这场变法在1132—1137年的再版。中兴之主赞同这种观点,并由此关闭了通向全面改革或任何机构变革的大门。富于怀旧色彩的王朝复兴观念引发了保守思潮,人们梦想回到太祖皇帝的黄金时代或至少变法之前的美好旧时光。一些知识分子怀着对变法及其恶果的强烈反感,不仅支持保守主义,而且身体力行,在对儒家遗产的解读中极力强调道德,坚信道德的方法是惟一出路,主张国家和社会都必须遵守道德,本书因此将他们称为道德保守主义者。^⑤

第三阶段持续时间相当长,从1137年与女真人进行和平谈判开始,一直到1164年中兴之主选择退位。这一阶段见证了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儒家理想被现实权力政治轧为齑粉的事实。与其愿望相左,知识分子们发现朝廷变得专制,有时甚至是独裁。出于战争的需要和国内国际双重的安全考虑,皇帝更倾向于大权独揽,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头等大事上自己单独拍板定案。当务之急有两项,一是让女真人停止侵略,二是将权力从那些不够忠诚听话的大将手中收回来。1164年,他决定以屈辱的条件接

受和平，并将权力托付给一位代理人以便平息反对意见。接着便出现了一连串反应，反对和议的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是从道德标准出发的保守主义者，不断以非官方手段表达批评。在皇帝的支持授意下，其代理人、权相秦桧^{〔1〕}打击和议反对派的行动扩大成为压制不同思想、政见的一般性政策。^{〔2〕}压制的后果便是专制上升为独裁。这位权相死于 1149 年，之后，皇帝改变了一些极端的做法，但无意放弃压制政策，更谈不上改弦更张了，令人窒息的氛围仍然存在。

在错综复杂的整个转变过程中，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几乎从未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生命力在消退，首先是从政治领域，然后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接下来，这种受压抑之后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领域弥散开去。知识分子首先发生变化，其他士大夫先是观望，而后跟进。整个统治阶级也随着精英的转向而转向，其影响逐渐波及到整个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

中兴之主统治的结束宣告了三个转型阶段的终结。其后，思想文化—政治氛围曾经出现显著改善，允许出现批评的声音和不同政见。开放的氛围持续了 10 年，直到 1159 年代。在 12 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出现了严重的皇位继承危机。第四任皇帝宁宗 7 在位期间 1194—1200 基本不管事，又一个权相韩侂胄^{〔3〕} 1194—1200 崛起了。为了驱逐、压制批评者，这位危险好斗的权相正式禁绝了新儒家，而后者正是道德保守主义者的传人和朱熹的追随者。

对新儒家的迫害使政治和思想文化氛围更加黑暗。韩侂胄率军对女真人开战，战争以错误筹划肇始，以失败告终，韩被处死。此后，情形缓慢好转，一些新儒家的追随者在朝廷上取得显赫地位。但是，他们既未能打破因循，也没能扩大知识分子的眼

界，却力图将自己的信仰奉为儒家正统，希望藉此将粗暴的独裁从专制政体中抹去。国家最终将他们所鼓吹的理论确认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然而，这胜利却得不偿失，因为专制政体从未真心诚意地要把新儒家理念转化为现实政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新正统本身反而成了专制政体的一种新的附和依从，压抑了成长的动力和多元化的发展。

好也罢，坏也罢，新儒家却持久地渗入了整个社会。直至 1840 年，在西方的冲击和日本战胜的影响下，中国方才出现近代化改革的迫切要求。在接连几代知识分子对变革的思考与辩争中，传统中国解体了。

为了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进行观察，有必要变换镜头和角度。以上，我们对儒家的不同派别作了一番笼统考察，并特别谈到了强调道德的保守派；下面，我们要把镜头转过来，看看保守主义者是如何随着专制皇帝和他所任命的宰相的关系的变化而发展的。为深入了解皇帝和宰相的关系，需要对一位宰相的政治生涯作显微式的观察；而后回归宏观视野，来观察其后果——国家正统思想的出现。最后，我们会再次换上望远镜头观察这一切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二、宋代学术

圆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以思想文化追求为其生活之道。把他们简单地视为只知争权夺利的政客或官僚，则难免忽略其思想、动机、价值观及生存环境中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欲知南宋政治的发展，必知其思想文化气象、战争的影响、经济以及领导者个人的心胸抱负。科举是入仕的正途，它测试的是一个人的文学才能和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力。当其入仕之始，一般是在三十几岁，大多数士大夫已经对文学颇具品味，对思想文化饶有见解，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在朝供职的最优秀分子——更对现代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体悟。习惯和信仰影响行为，而特定时期所流行的学术思潮则塑造了习惯和信仰。

本章将要探讨中国传统学术四大分支中的三支：文学、经学和史学。第四大分支，即以儒学为表现形式的哲学，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讨论。这两章合起来便构成一个全面而简明的宋学总论。关于宋代的哲学和文学，曾经出现过为数众多的著述。而关于宋代的经学和史学，却只有一些通史性著作或极其专门的论文可供参考。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这

圆

四大分支作过融会贯通的研究，这两章将填补这一空白。为与第一章的论述焦点相一致，在每一分支的叙述中，我们都将着重探讨 11 世纪的差异，以便找出南宋之迥异于北宋的变化线索。接下来，下一章将阐明儒学之所以包容一切、影响遍及政治和其他学术分支的原因。

文学

在传统中国，对于士大夫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有文化”的意义远不止于能够写作常规的书面文件。在他们的世界里，良好的教育意味着能写文学作品，更高水平的则会用高雅的形式写作具有创意的作品。文人的写作不仅是一种快乐，是抒情与交流的方式和个人成就的载体，还是丰富文化内涵、推动文化发展的行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使他们尤其重视文学形式和文学理论问题，而在西方现代，这类问题却除了专家和欲为专家者外极少有人问津。

中国文学的两种最主要体裁——律诗和散文，不仅是一个绅士的必要技能，还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其他诸如杂文、故事、小说、社交场合的应酬文字、笔记、词等体裁的分量就轻得多了。律诗被视为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并曾经在历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然而，自宋朝以降，散文却作为有效的基本交流工具取得了更高的实用价值。

唐诗是公认的黄金时代的完美结晶，而 11 世纪的宋诗则是唐诗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宋诗的形式和内容臻于成熟，其风格与唐诗多有不同而二者同样杰出，双峰并峙。^①此后，只有个别诗人曾经再度攀上那样的高度。

圆

宋诗的一个特点是在常用语汇、表达方式、遣词造句和诗歌主题等方面趋向通俗化。诗人们开始打破经典语汇的束缚,将口语的表达方式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象引入笔端。写作的重点从抒发个人情感转向与他人,主要是其他同样有文化的人进行交流。这个世纪著名的诗歌理论,恰如下文所引: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②

然而,11与12世纪之交,诗坛却出现了竞相玩弄复杂修辞的风气,以为诗应当尽可能地浓缩、凝雪,又当如炉中炼铁般反复锤打、炼雪。受此风气影响,无数诗人在一个诗句当中堆叠数重隐喻、讽喻、联想,并力图将它们和全诗的其他部分附会粘连起来。一些诗表现出一种以牺牲真实情感为代价的造作的凝炼,还有一些则晦涩难懂。宋诗已从成熟转向过度成熟。

唐和北宋的诗风在12世纪盛极而衰,13世纪的诗呈现出取向各异、流派纷呈的景象。^③一些诗人选择唾手可得的事物,比如落叶上的一滴露珠或似乎是迷失在月色中的一只小昆虫这样一些瞬间景物,用一种高度浓缩和抽象的形式来形象地传递深刻的情感。另一些诗人则关注个体的深切感悟、性雪和灵感冲动的时刻。凝雪 还有一些诗人致力于遣词用字,不仅要做到单纯的技巧娴熟或是单纯的巧妙,而且要做到技巧娴熟的巧妙、巧雪不仅要做到犀利,而且要做到突出的犀利。凝雪 也有一些诗人并不太关注复杂难懂的诗歌技巧,而更重视用极其微妙、语义隐晦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心境和感受。

圆原

当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体发展达到饱和状态时,一种另类诗

体——词却已经独擅胜场。12世纪,诗人们从勾栏瓦肆中受到激发,借鉴其表达形式,开始了词的创作。歌伎们擅长的是流行歌曲,而诗人所要引进的却是一种新的艺术类型,一种无须音乐伴奏的歌。^④词以其抒情性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种起初并不起眼的诗歌形式,到13世纪已成为诗中大宗。尽管摆脱了原始的音乐伴奏的束缚,但是,词的写作仍然必须以长短不齐的句式来构成一定的韵律模式,以此传情达意,谐和音律。词的形式比律诗更为灵活。一般而言,词要比律诗长,读来声音婉转,语调迂回曲折,富于变化。词将口语语汇与古典用语熔为一炉,由此造成更为生动活泼、更富创造力的表达方式,既能传递婉约的情感,也能抒发豪放的胸怀。简言之,宋词以其自身的魅力构成了一种与唐诗同等重要的文学体裁。

还有一种与诗颇为接近的文学体裁——赋。西方的诗和散文是截然两分的,不存在中间形态。但在中国传统文学当中,却存在这样的中间形态。赋的气质恰处于诗与散文之间,虽然人们常将它与诗相提并论。经典原始的赋可以说是“散文诗”,一种精雕细琢的广义的诗。从北宋开始,在散文地位上升的拉动下,出现了一种新体的赋,其特点转而变成“诗化散文”,或者说拥有高度诗化品质的散文。

本文无意详述赋的复杂写作技巧,只想简明扼要地解释它所发生的变化。起初,赋必须严格遵循两个对偶句相押韵的要求。例如,科举考试便对押韵有严格的规定。对偶句是两两相连的一对句子,它们有着恰好相同的字数,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句法顺序,两个句子中的相对应的词互相对称、协调、对比或关联。

12世纪中期,几位才华横溢的先驱者大胆突破陈窠,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赋。他们一扫赋在押韵和句式结构上的严格技术

要求,只是自然贴切地在这儿或那儿写下几行押韵或对偶的句子,由此获得了表达的自由。这就和西方意义上的散文更加接近了。但是,中国人从未将此类文章看做寻常散文。因为,它仍然保留并反映着古典赋体高度诗化的品质,它是一种新的赋,并和旧赋一样受到尊崇。正是在此意义层面上,我们称之为“诗化散文”。赋的这种变化不是从宋诗的一面衍生出来的,而是北宋散文发展推动的结果,下面我们就要谈到散文。

自古以来,在文学的价值等级上,散文就一直排在诗、赋之后。唐代最显赫的散文形式是对偶散文^①。骈文深受赋的影响,例如,它大多以排偶句式写作,一组排偶句的字数通常是源-远-源-远。因此,骈文的别名又叫“四六文”。在骈文显赫的情形下,还是有一些不肯墨守成规的人,力主打破一切对形式和修辞手段的规定、限制,写作并鼓吹一种风格松散的文^②。散文雪

在这些唱反调的人当中,最突出的是韩愈^③。韩愈高扬儒家传统,力排佛、道,主张“文以贯道”,意思是写文章的本来目的是传递正确观念。显然,就这一目的而言,骈文和其他形式主义的东​​西都不是最佳手段,因为它们经常会使作者无法畅所欲言。为了实践其所倡导的理论,韩愈率先改进了古典散文的形式,写作风格松散的散文。后世的崇拜者认为韩愈的“古体”^④或更客观地说“拟古体”^⑤雪矫正了几百年来以文害意的文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㐀 㐁 㐂 㐃 㐄 㐅 㐆 㐇 㐈 㐉 㐊 㐋 㐌 㐍 㐎 㐏 㐐 㐑 㐒 㐓 㐔 㐕 㐖 㐗 㐘 㐙 㐚 㐛 㐜 㐝 㐞 㐟 㐠 㐡 㐢 㐣 㐤 㐥 㐦 㐧 㐨 㐩 㐪 㐫 㐬 㐭 㐮 㐯 㐰 㐱 㐲 㐳 㐴 㐵 㐶 㐷 㐸 㐹 㐺 㐻 㐼 㐽 㐾 㐿 㑀 㑁 㑂 㑃 㑄 㑅 㑆 㑇 㑈 㑉 㑊 㑋 㑌 㑍 㑎 㑏 㑐 㑑 㑒 㑓 㑔 㑕 㑖 㑗 㑘 㑙 㑚 㑛 㑜 㑝 㑞 㑟 㑠 㑡 㑢 㑣 㑤 㑥 㑦 㑧 㑨 㑩 㑪 㑫 㑬 㑭 㑮 㑯 㑰 㑱 㑲 㑳 㑴 㑵 㑶 㑷 㑸 㑹 㑺 㑻 㑼 㑽 㑾 㑿 㒀 㒁 㒂 㒃 㒄 㒅 㒆 㒇 㒈 㒉 㒊 㒋 㒌 㒍 㒎 㒏 㒐 㒑 㒒 㒓 㒔 㒕 㒖 㒗 㒘 㒙 㒚 㒛 㒜 㒝 㒞 㒟 㒠 㒡 㒢 㒣 㒤 㒥 㒦 㒧 㒨 㒩 㒪 㒫 㒬 㒭 㒮 㒯 㒰 㒱 㒲 㒳 㒴 㒵 㒶 㒷 㒸 㒹 㒺 㒻 㒼 㒽 㒾 㒿 㓀 㓁 㓂 㓃 㓄 㓅 㓆 㓇 㓈 㓉 㓊 㓋 㓌 㓍 㓎 㓏 㓐 㓑 㓒 㓓 㓔 㓕 㓖 㓗 㓘 㓙 㓚 㓛 㓜 㓝 㓞 㓟 㓠 㓡 㓢 㓣 㓤 㓥 㓦 㓧 㓨 㓩 㓪 㓫 㓬 㓭 㓮 㓯 㓰 㓱 㓲 㓳 㓴 㓵 㓶 㓷 㓸 㓹 㓺 㓻 㓼 㓽 㓾 㓿 㔀 㔁 㔂 㔃 㔄 㔅 㔆 㔇 㔈 㔉 㔊 㔋 㔌 㔍 㔎 㔏 㔐 㔑 㔒 㔓 㔔 㔕 㔖 㔗 㔘 㔙 㔚 㔛 㔜 㔝 㔞 㔟 㔠 㔡 㔢 㔣 㔤 㔥 㔦 㔧 㔨 㔩 㔪 㔫 㔬 㔭 㔮 㔯 㔰 㔱 㔲 㔳 㔴 㔵 㔶 㔷 㔸 㔹 㔺 㔻 㔼 㔽 㔾 㔿 㕀 㕁 㕂 㕃 㕄 㕅 㕆 㕇 㕈 㕉 㕊 㕋 㕌 㕍 㕎 㕏 㕐 㕑 㕒 㕓 㕔 㕕 㕖 㕗 㕘 㕙 㕚 㕛 㕜 㕝 㕞 㕟 㕠 㕡 㕢 㕣 㕤 㕥 㕦 㕧 㕨 㕩 㕪 㕫 㕬 㕭 㕮 㕯 㕰 㕱 㕲 㕳 㕴 㕵 㕶 㕷 㕸 㕹 㕺 㕻 㕼 㕽 㕾 㕿 㖀 㖁 㖂 㖃 㖄 㖅 㖆 㖇 㖈 㖉 㖊 㖋 㖌 㖍 㖎 㖏 㖐 㖑 㖒 㖓 㖔 㖕 㖖 㖗 㖘 㖙 㖚 㖛 㖜 㖝 㖞 㖟 㖠 㖡 㖢 㖣 㖤 㖥 㖦 㖧 㖨 㖩 㖪 㖫 㖬 㖭 㖮 㖯 㖰 㖱 㖲 㖳 㖴 㖵 㖶 㖷 㖸 㖹 㖺 㖻 㖼 㖽 㖾 㖿 㗀 㗁 㗂 㗃 㗄 㗅 㗆 㗇 㗈 㗉 㗊 㗋 㗌 㗍 㗎 㗏 㗐 㗑 㗒 㗓 㗔 㗕 㗖 㗗 㗘 㗙 㗚 㗛 㗜 㗝 㗞 㗟 㗠 㗡 㗢 㗣 㗤 㗥 㗦 㗧 㗨 㗩 㗪 㗫 㗬 㗭 㗮 㗯 㗰 㗱 㗲 㗳 㗴 㗵 㗶 㗷 㗸 㗹 㗺 㗻 㗼 㗽 㗾 㗿 㘀 㘁 㘂 㘃 㘄 㘅 㘆 㘇 㘈 㘉 㘊 㘋 㘌 㘍 㘎 㘏 㘐 㘑 㘒 㘓 㘔 㘕 㘖 㘗 㘘 㘙 㘚 㘛 㘜 㘝 㘞 㘟 㘠 㘡 㘢 㘣 㘤 㘥 㘦 㘧 㘨 㘩 㘪 㘫 㘬 㘭 㘮 㘯 㘰 㘱 㘲 㘳 㘴 㘵 㘶 㘷 㘸 㘹 㘺 㘻 㘼 㘽 㘾 㘿 㙀 㙁 㙂 㙃 㙄 㙅 㙆 㙇 㙈 㙉 㙊 㙋 㙌 㙍 㙎 㙏 㙐 㙑 㙒 㙓 㙔 㙕 㙖 㙗 㙘 㙙 㙚 㙛 㙜 㙝 㙞 㙟 㙠 㙡 㙢 㙣 㙤 㙥 㙦 㙧 㙨 㙩 㙪 㙫 㙬 㙭 㙮 㙯 㙰 㙱 㙲 㙳 㙴 㙵 㙶 㙷 㙸 㙹 㙺 㙻 㙼 㙽 㙾 㙿 㚀 㚁 㚂 㚃 㚄 㚅 㚆 㚇 㚈 㚉 㚊 㚋 㚌 㚍 㚎 㚏 㚐 㚑 㚒 㚓 㚔 㚕 㚖 㚗 㚘 㚙 㚚 㚛 㚜 㚝 㚞 㚟 㚠 㚡 㚢 㚣 㚤 㚥 㚦 㚧 㚨 㚩 㚪 㚫 㚬 㚭 㚮 㚯 㚰 㚱 㚲 㚳 㚴 㚵 㚶 㚷 㚸 㚹 㚺 㚻 㚼 㚽 㚾 㚿 㜀 㜁 㜂 㜃 㜄 㜅 㜆 㜇 㜈 㜉 㜊 㜋 㜌 㜍 㜎 㜏 㜐 㜑 㜒 㜓 㜔 㜕 㜖 㜗 㜘 㜙 㜚 㜛 㜜 㜝 㜞 㜟 㜠 㜡 㜢 㜣 㜤 㜥 㜦 㜧 㜨 㜩 㜪 㜫 㜬 㜭 㜮 㜯 㜰 㜱 㜲 㜳 㜴 㜵 㜶 㜷 㜸 㜹 㜺 㜻 㜼 㜽 㜾 㜿 㝀 㝁 㝂 㝃 㝄 㝅 㝆 㝇 㝈 㝉 㝊 㝋 㝌 㝍 㝎 㝏 㝐 㝑 㝒 㝓 㝔 㝕 㝖 㝗 㝘 㝙 㝚 㝛 㝜 㝝 㝞 㝟 㝠 㝡 㝢 㝣 㝤 㝥 㝦 㝧 㝨 㝩 㝪 㝫 㝬 㝭 㝮 㝯 㝰 㝱 㝲 㝳 㝴 㝵 㝶 㝷 㝸 㝹 㝺 㝻 㝼 㝽 㝾 㝿 㞀 㞁 㞂 㞃 㞄 㞅 㞆 㞇 㞈 㞉 㞊 㞋 㞌 㞍 㞎 㞏 㞐 㞑 㞒 㞓 㞔 㞕 㞖 㞗 㞘 㞙 㞚 㞛 㞜 㞝 㞞 㞟 㞠 㞡 㞢 㞣 㞤 㞥 㞦 㞧 㞨 㞩 㞪 㞫 㞬 㞭 㞮 㞯 㞰 㞱 㞲 㞳 㞴 㞵 㞶 㞷 㞸 㞹 㞺 㞻 㞼 㞽 㞾 㞿 㟀 㟁 㟂 㟃 㟄 㟅 㟆 㟇 㟈 㟉 㟊 㟋 㟌 㟍 㟎 㟏 㟐 㟑 㟒 㟓 㟔 㟕 㟖 㟗 㟘 㟙 㟚 㟛 㟜 㟝 㟞 㟟 㟠 㟡 㟢 㟣 㟤 㟥 㟦 㟧 㟨 㟩 㟪 㟫 㟬 㟭 㟮 㟯 㟰 㟱 㟲 㟳 㟴 㟵 㟶 㟷 㟸 㟹 㟺 㟻 㟼 㟽 㟾 㟿 㠀 㠁 㠂 㠃 㠄 㠅 㠆 㠇 㠈 㠉 㠊 㠋 㠌 㠍 㠎 㠏 㠐 㠑 㠒 㠓 㠔 㠕 㠖 㠗 㠘 㠙 㠚 㠛 㠜 㠝 㠞 㠟 㠠 㠡 㠢 㠣 㠤 㠥 㠦 㠧 㠨 㠩 㠪 㠫 㠬 㠭 㠮 㠯 㠰 㠱 㠲 㠳 㠴 㠵 㠶 㠷 㠸 㠹 㠺 㠻 㠼 㠽 㠾 㠿 㡀 㡁 㡂 㡃 㡄 㡅 㡆 㡇 㡈 㡉 㡊 㡋 㡌 㡍 㡎 㡏 㡐 㡑 㡒 㡓 㡔 㡕 㡖 㡗 㡘 㡙 㡚 㡛 㡜 㡝 㡞 㡟 㡠 㡡 㡢 㡣 㡤 㡥 㡦 㡧 㡨 㡩 㡪 㡫 㡬 㡭 㡮 㡯 㡰 㡱 㡲 㡳 㡴 㡵 㡶 㡷 㡸 㡹 㡺 㡻 㡼 㡽 㡾 㡿 㢀 㢁 㢂 㢃 㢄 㢅 㢆 㢇 㢈 㢉 㢊 㢋 㢌 㢍 㢎 㢏 㢐 㢑 㢒 㢓 㢔 㢕 㢖 㢗 㢘 㢙 㢚 㢛 㢜 㢝 㢞 㢟 㢠 㢡 㢢 㢣 㢤 㢥 㢦 㢧 㢨 㢩 㢪 㢫 㢬 㢭 㢮 㢯 㢰 㢱 㢲 㢳 㢴 㢵 㢶 㢷 㢸 㢹 㢺 㢻 㢼 㢽 㢾 㢿 㣀 㣁 㣂 㣃 㣄 㣅 㣆 㣇 㣈 㣉 㣊 㣋 㣌 㣍 㣎 㣏 㣐 㣑 㣒 㣓 㣔 㣕 㣖 㣗 㣘 㣙 㣚 㣛 㣜 㣝 㣞 㣟 㣠 㣡 㣢 㣣 㣤 㣥 㣦 㣧 㣨 㣩 㣪 㣫 㣬 㣭 㣮 㣯 㣰 㣱 㣲 㣳 㣴 㣵 㣶 㣷 㣸 㣹 㣺 㣻 㣼 㣽 㣾 㣿 㤀 㤁 㤂 㤃 㤄 㤅 㤆 㤇 㤈 㤉 㤊 㤋 㤌 㤍 㤎 㤏 㤐 㤑 㤒 㤓 㤔 㤕 㤖 㤗 㤘 㤙 㤚 㤛 㤜 㤝 㤞 㤟 㤠 㤡 㤢 㤣 㤤 㤥 㤦 㤧 㤨 㤩 㤪 㤫 㤬 㤭 㤮 㤯 㤰 㤱 㤲 㤳 㤴 㤵 㤶 㤷 㤸 㤹 㤺 㤻 㤼 㤽 㤾 㤿 㥀 㥁 㥂 㥃 㥄 㥅 㥆 㥇 㥈 㥉 㥊 㥋 㥌 㥍 㥎 㥏 㥐 㥑 㥒 㥓 㥔 㥕 㥖 㥗 㥘 㥙 㥚 㥛 㥜 㥝 㥞 㥟 㥠 㥡 㥢 㥣 㥤 㥥 㥦 㥧 㥨 㥩 㥪 㥫 㥬 㥭 㥮 㥯 㥰 㥱 㥲 㥳 㥴 㥵 㥶 㥷 㥸 㥹 㥺 㥻 㥼 㥽 㥾 㥿 㦀 㦁 㦂 㦃 㦄 㦅 㦆 㦇 㦈 㦉 㦊 㦋 㦌 㦍 㦎 㦏 㦐 㦑 㦒 㦓 㦔 㦕 㦖 㦗 㦘 㦙 㦚 㦛 㦜 㦝 㦞 㦟 㦠 㦡 㦢 㦣 㦤 㦥 㦦 㦧 㦨 㦩 㦪 㦫 㦬 㦭 㦮 㦯 㦰 㦱 㦲 㦳 㦴 㦵 㦶 㦷 㦸 㦹 㦺 㦻 㦼 㦽 㦾 㦿 㧀 㧁 㧂 㧃 㧄 㧅 㧆 㧇 㧈 㧉 㧊 㧋 㧌 㧍 㧎 㧏 㧐 㧑 㧒 㧓 㧔 㧕 㧖 㧗 㧘 㧙 㧚 㧛 㧜 㧝 㧞 㧟 㧠 㧡 㧢 㧣 㧤 㧥 㧦 㧧 㧨 㧩 㧪 㧫 㧬 㧭 㧮 㧯 㧰 㧱 㧲 㧳 㧴 㧵 㧶 㧷 㧸 㧹 㧺 㧻 㧼 㧽 㧾 㧿 㨀 㨁 㨂 㨃 㨄 㨅 㨆 㨇 㨈 㨉 㨊 㨋 㨌 㨍 㨎 㨏 㨐 㨑 㨒 㨓 㨔 㨕 㨖 㨗 㨘 㨙 㨚 㨛 㨜 㨝 㨞 㨟 㨠 㨡 㨢 㨣 㨤 㨥 㨦 㨧 㨨 㨩 㨪 㨫 㨬 㨭 㨮 㨯 㨰 㨱 㨲 㨳 㨴 㨵 㨶 㨷 㨸 㨹 㨺 㨻 㨼 㨽 㨾 㨿 㩀 㩁 㩂 㩃 㩄 㩅 㩆 㩇 㩈 㩉 㩊 㩋 㩌 㩍 㩎 㩏 㩐 㩑 㩒 㩓 㩔 㩕 㩖 㩗 㩘 㩙 㩚 㩛 㩜 㩝 㩞 㩟 㩠 㩡 㩢 㩣 㩤 㩥 㩦 㩧 㩨 㩩 㩪 㩫 㩬 㩭 㩮 㩯 㩰 㩱 㩲 㩳 㩴 㩵 㩶 㩷 㩸 㩹 㩺 㩻 㩼 㩽 㩾 㩿 㪀 㪁 㪂 㪃 㪄 㪅 㪆 㪇 㪈 㪉 㪊 㪋 㪌 㪍 㪎 㪏 㪐 㪑 㪒 㪓 㪔 㪕 㪖 㪗 㪘 㪙 㪚 㪛 㪜 㪝 㪞 㪟 㪠 㪡 㪢 㪣 㪤 㪥 㪦 㪧 㪨 㪩 㪪 㪫 㪬 㪭 㪮 㪯 㪰 㪱 㪲 㪳 㪴 㪵 㪶 㪷 㪸 㪹 㪺 㪻 㪼 㪽 㪾 㪿 㫀 㫁 㫂 㫃 㫄 㫅 㫆 㫇 㫈 㫉 㫊 㫋 㫌 㫍 㫎 㫏 㫐 㫑 㫒 㫓 㫔 㫕 㫖 㫗 㫘 㫙 㫚 㫛 㫜 㫝 㫞 㫟 㫠 㫡 㫢 㫣 㫤 㫥 㫦 㫧 㫨 㫩 㫪 㫫 㫬 㫭 㫮 㫯 㫰 㫱 㫲 㫳 㫴 㫵 㫶 㫷 㫸 㫹 㫺 㫻 㫼 㫽 㫾 㫿 㬀 㬁 㬂 㬃 㬄 㬅 㬆 㬇 㬈 㬉 㬊 㬋 㬌 㬍 㬎 㬏 㬐 㬑 㬒 㬓 㬔 㬕 㬖 㬗 㬘 㬙 㬚 㬛 㬜 㬝 㬞 㬟 㬠 㬡 㬢 㬣 㬤 㬥 㬦 㬧 㬨 㬩 㬪 㬫 㬬 㬭 㬮 㬯 㬰 㬱 㬲 㬳 㬴 㬵 㬶 㬷 㬸 㬹 㬺 㬻 㬼 㬽 㬾 㬿 㭀 㭁 㭂 㭃 㭄 㭅 㭆 㭇 㭈 㭉 㭊 㭋 㭌 㭍 㭎 㭏 㭐 㭑 㭒 㭓 㭔 㭕 㭖 㭗 㭘 㭙 㭚 㭛 㭜 㭝 㭞 㭟 㭠 㭡 㭢 㭣 㭤 㭥 㭦 㭧 㭨 㭩 㭪 㭫 㭬 㭭 㭮 㭯 㭰 㭱 㭲 㭳 㭴 㭵 㭶 㭷 㭸 㭹 㭺 㭻 㭼 㭽 㭾 㭿 㮀 㮁 㮂 㮃 㮄 㮅 㮆 㮇 㮈 㮉 㮊 㮋 㮌 㮍 㮎 㮏 㮐 㮑 㮒 㮓 㮔 㮕 㮖 㮗 㮘 㮙 㮚 㮛 㮜 㮝 㮞 㮟 㮠 㮡 㮢 㮣 㮤 㮥 㮦 㮧 㮨 㮩 㮪 㮫 㮬 㮭 㮮 㮯 㮰 㮱 㮲 㮳 㮴 㮵 㮶 㮷 㮸 㮹 㮺 㮻 㮼 㮽 㮾 㮿 㯀 㯁 㯂 㯃 㯄 㯅 㯆 㯇 㯈 㯉 㯊 㯋 㯌 㯍 㯎 㯏 㯐 㯑 㯒 㯓 㯔 㯕 㯖 㯗 㯘 㯙 㯚 㯛 㯜 㯝 㯞 㯟 㯠 㯡 㯢 㯣 㯤 㯥 㯦 㯧 㯨 㯩 㯪 㯫 㯬 㯭 㯮 㯯 㯰 㯱 㯲 㯳 㯴 㯵 㯶 㯷 㯸 㯹 㯺 㯻 㯼 㯽 㯾 㯿 㰀 㰁 㰂 㰃 㰄 㰅 㰆 㰇 㰈 㰉 㰊 㰋 㰌 㰍 㰎 㰏 㰐 㰑 㰒 㰓 㰔 㰕 㰖 㰗 㰘 㰙 㰚 㰛 㰜 㰝 㰞 㰟 㰠 㰡 㰢 㰣 㰤 㰥 㰦 㰧 㰨 㰩 㰪 㰫 㰬 㰭 㰮 㰯 㰰 㰱 㰲 㰳 㰴 㰵 㰶 㰷 㰸 㰹 㰺 㰻 㰼 㰽 㰾 㰿 㱀 㱁 㱂 㱃 㱄 㱅 㱆 㱇 㱈 㱉 㱊 㱋 㱌 㱍 㱎 㱏 㱐 㱑 㱒 㱓 㱔 㱕 㱖 㱗 㱘 㱙 㱚 㱛 㱜 㱝 㱞 㱟 㱠 㱡 㱢 㱣 㱤 㱥 㱦 㱧 㱨 㱩 㱪 㱫 㱬 㱭 㱮 㱯 㱰 㱱 㱲 㱳 㱴 㱵 㱶 㱷 㱸 㱹 㱺 㱻 㱼 㱽 㱾 㱿 㲀 㲁 㲂 㲃 㲄 㲅 㲆 㲇 㲈 㲉 㲊 㲋 㲌 㲍 㲎 㲏 㲐 㲑 㲒 㲓 㲔 㲕 㲖 㲗 㲘 㲙 㲚 㲛 㲜 㲝 㲞 㲟 㲠 㲡 㲢 㲣 㲤 㲥 㲦 㲧 㲨 㲩 㲪 㲫 㲬 㲭 㲮 㲯 㲰 㲱 㲲 㲳 㲴 㲵 㲶 㲷 㲸 㲹 㲺 㲻 㲼 㲽 㲾 㲿 㳀 㳁 㳂 㳃 㳄 㳅 㳆 㳇 㳈 㳉 㳊 㳋 㳌 㳍 㳎 㳏 㳐 㳑 㳒 㳓 㳔 㳕 㳖 㳗 㳘 㳙 㳚 㳛 㳜 㳝 㳞 㳟 㳠 㳡 㳢 㳣 㳤 㳥 㳦 㳧 㳨 㳩 㳪 㳫 㳬 㳭 㳮 㳯 㳰 㳱 㳲 㳳 㳴 㳵 㳶 㳷 㳸 㳹 㳺 㳻 㳼 㳽 㳾 㳿 㴀 㴁 㴂 㴃 㴄 㴅 㴆 㴇 㴈 㴉 㴊 㴋 㴌 㴍 㴎 㴏 㴐 㴑 㴒 㴓 㴔 㴕 㴖 㴗 㴘 㴙 㴚 㴛 㴜 㴝 㴞 㴟 㴠 㴡 㴢 㴣 㴤 㴥 㴦 㴧 㴨 㴩 㴪 㴫 㴬 㴭 㴮 㴯 㴰 㴱 㴲 㴳 㴴 㴵 㴶 㴷 㴸 㴹 㴺 㴻 㴼 㴽 㴾 㴿 㵀 㵁 㵂 㵃 㵄 㵅 㵆 㵇 㵈 㵉 㵊 㵋 㵌 㵍 㵎 㵏 㵐 㵑 㵒 㵓 㵔 㵕 㵖 㵗 㵘 㵙 㵚 㵛 㵜 㵝 㵞 㵟 㵠 㵡 㵢 㵣 㵤 㵥 㵦 㵧 㵨 㵩 㵪 㵫 㵬 㵭 㵮 㵯 㵰 㵱 㵲 㵳 㵴 㵵 㵶 㵷 㵸 㵹 㵺 㵻 㵼 㵽 㵾 㵿 㶀 㶁 㶂 㶃 㶄 㶅 㶆 㶇 㶈 㶉 㶊 㶋 㶌 㶍 㶎 㶏 㶐 㶑 㶒 㶓 㶔 㶕 㶖 㶗 㶘 㶙 㶚 㶛 㶜 㶝 㶞 㶟 㶠 㶡 㶢 㶣 㶤 㶥 㶦 㶧 㶨 㶩 㶪 㶫 㶬 㶭 㶮 㶯 㶰 㶱 㶲 㶳 㶴 㶵 㶶 㶷 㶸 㶹 㶺 㶻 㶼 㶽 㶾 㶿 㷀 㷁 㷂 㷃 㷄 㷅 㷆 㷇 㷈 㷉 㷊 㷋 㷌 㷍 㷎 㷏 㷐 㷑 㷒 㷓 㷔 㷕 㷖 㷗 㷘 㷙 㷚 㷛 㷜 㷝 㷞 㷟 㷠 㷡 㷢 㷣 㷤 㷥 㷦 㷧 㷨 㷩 㷪 㷫 㷬 㷭 㷮 㷯 㷰 㷱 㷲 㷳 㷴 㷵 㷶 㷷 㷸 㷹 㷺 㷻 㷼 㷽 㷾 㷿 㸀 㸁 㸂 㸃 㸄 㸅 㸆 㸇 㸈 㸉 㸊 㸋 㸌 㸍 㸎 㸏 㸐 㸑 㸒 㸓 㸔 㸕 㸖 㸗 㸘 㸙 㸚 㸛 㸜 㸝 㸞 㸟 㸠 㸡 㸢 㸣 㸤 㸥 㸦 㸧 㸨 㸩 㸪 㸫 㸬 㸭 㸮 㸯 㸰 㸱 㸲 㸳 㸴 㸵 㸶 㸷 㸸 㸹 㸺 㸻 㸼 㸽 㸾 㸿 㹀 㹁 㹂 㹃 㹄 㹅 㹆 㹇 㹈 㹉 㹊 㹋 㹌 㹍 㹎 㹏 㹐 㹑 㹒 㹓 㹔 㹕 㹖 㹗 㹘 㹙 㹚 㹛 㹜 㹝 㹞 㹟 㹠 㹡 㹢 㹣 㹤 㹥 㹦 㹧 㹨 㹩 㹪 㹫 㹬 㹭 㹮 㹯 㹰 㹱 㹲 㹳 㹴 㹵 㹶 㹷 㹸 㹹 㹺 㹻 㹼 㹽 㹿 㺀 㺁 㺂 㺃 㺄 㺅 㺆 㺇 㺈 㺉 㺊 㺋 㺌 㺍 㺎 㺏 㺐 㺑 㺒 㺓 㺔 㺕 㺖 㺗 㺘 㺙 㺚 㺛 㺜 㺝 㺞 㺟 㺠 㺡 㺢 㺣 㺤 㺥 㺦 㺧 㺨 㺩 㺪 㺫 㺬 㺭 㺮 㺯 㺰 㺱 㺲 㺳 㺴 㺵 㺶 㺷 㺸 㺹 㺺 㺻 㺼 㺽 㺾 㺿 㻀 㻁 㻂 㻃 㻄 㻅 㻆 㻇 㻈 㻉 㻊 㻋 㻌 㻍 㻎 㻏 㻐 㻑 㻒 㻓 㻔 㻕 㻖 㻗 㻘 㻙 㻚 㻛 㻜 㻝 㻞 㻟 㻠 㻡 㻢 㻣 㻤 㻥 㻦 㻧 㻨 㻩 㻪 㻫 㻬 㻭 㻮 㻯 㻰 㻱 㻲 㻳 㻴 㻵 㻶 㻷 㻸 㻹 㻺 㻻 㻼 㻽 㻾 㻿 㼀 㼁 㼂 㼃 㼄 㼅 㼆 㼇 㼈 㼉 㼊 㼋 㼌 㼍 㼎 㼏 㼐 㼑 㼒 㼓 㼔 㼕 㼖 㼗 㼘 㼙 㼚 㼛 㼜 㼝 㼞 㼟 㼠 㼡 㼢 㼣 㼤 㼥 㼦 㼧 㼨 㼩 㼪 㼫 㼬 㼭 㼮 㼯 㼰 㼱 㼲 㼳 㼴 㼵 㼶 㼷 㼸 㼹 㼺 㼻 㼼 㼽 㼾 㼿 㽀

将其理论化,但却没有写出令后世推崇的杰作,作品质量再也无法与北宋相媲美。颇受好评的散文选集《宋文鉴》出自南宋文人之手^⑥,但所选皆为北宋经典作家的作品,不包括任何时代更近的南宋初期作品。或许,时人已经默认,近期没有一位文学家能与一个世纪前的先辈们比肩而立。造成这种改变的一个原因是,此期,哲学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其抽象思维比纯文学更具挑战性;因此,大部分创造性能量不再投向文学。当然,儒学形式的哲学并非孤立的学术分支,经学是其依托。

经 学

中国古代的经,本来是世俗的,却被尊为圣人著作,地位近乎神圣。同前代相比,宋儒将经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基础,更加孜孜不倦地为这些权威书籍讲解作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北宋经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到了南宋,解经著作的质量开始下降,变得喜欢争辩,过于关注细节,研究范围趋向狭窄,文字冗长^⑦。唆,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

下面简要阐述 11 世纪的经学研究氛围。在《易经》的研究当中,11 世纪主要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将书中的象和数视为神圣和超自然,另一派则试图用理性的原则加以解释。11 世纪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有人以历史实例解经,有人将老子的自然哲学引入经解,还有人将解经同佛教禅宗教义相结合。流行趋势是将占卜算命的方法和理性的方法相调和。例如,朱熹的许多著述便是将前人解释系统化,而非新创。^⑧发展趋势再也不是外向的了。

从汉代起,人们便对《书经》《尚书》文字的真伪产生了争

论,有半信半疑的,也有坚信不疑的。11 世纪的《尚书》研究与之大异其趣。同其《周礼》研究一样,王安石为《书经》作《新义》,强调政府机构的功能,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而苏轼则为《尚书》作了最好的注释,强调它人性化的一面。到 12 世纪,争论的力度减弱了。朱熹虽然对苏轼多有微辞,却赞赏这部书。然而,朱熹之后的新儒家们却宁愿忽略它,只因苏轼曾经激烈地攻击过该学派的祖师之一程颐^⑨。

相对于前文提到的两宋经学概观而言,《诗经》的研究似乎是个例外。在 11 世纪,关于《诗经》只有几家注释和一些不激烈的讨论。而相比之下,12 世纪的学者却相当重视《诗经》,注者众多。引发了这种兴趣的应当是诗和词的发展。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这部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然而,在表面的数量膨胀之下,却是经解质量的下降。大多数关于《诗经》的研究,包括朱熹的著述在内,都不是那么具有权威性。^⑩

古代经书中的“礼”不仅指仪式,还包括涉及社会风俗、传统习惯、经济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现代语言来说,它指的是社会道德规范所承认的行为。在有关礼的三部经当中,宋人轻《礼记》、《仪礼》而最重《周礼》,围绕它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王安石以前,曾出现过一批具有 11 世纪早期特征的观点各异的解释。而王安石则在《周礼》中发掘到了改革的范本。此后直至 1127 年北宋灭亡,王安石和他第二代的追随者先后掌权,绝大多数学者或出于自愿,或迫于改革体制的压力,接受了王安石的解释。一致性取代多元化成为流行。^⑪

1127 年,保守的反对派短期复辟,主张贬低三礼,不自觉地缩小了此后的学术范围。《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以措辞行褒贬,充满道德关怀,又以曾经孔子亲订而闻名。保守派将其发扬光大,以之衡量行为的正当性。他们沿用孙复